浅论近代中国女性解放和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压迫与进步

王俊琪（清华大学电机系电15班，2021011517，jq-wang21@mails.tsinghua.edu.cn）

**摘 要**：从性别研究的视角来看，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近代中国史上产生了多次女性解放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伴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极大变迁。从清末到新中国建立以来，多次改革，革命与近代思潮的蓬勃兴起对近代中国女性解放和地位的提升起到了很大作用。研究近代中国女性解放和社会地位的变迁对于近现代中国整体历史社会的研究，以及当代社会性别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近代中国史；性别研究；女性地位；女性解放

1. 问题研究背景

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通过论述家庭婚姻制度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指出了女性地位长期相对低下的制度和文化根源：父权社会下专偶制家庭中女性的从属地位。在古代中国，这种不平等的结构性矛盾更加明显。封建专制主义中国统治者将儒家伦理学说作为正统由上而下钳制社会思想，而这种学说中天然嵌入了歧视压迫女性的特质[[1]](#footnote-1)，进一步加固了女性在家庭与社会层次上对男性的附属地位与社会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因此，从汉朝到清末，中国女性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一部“苦难史”。

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及其人民进入了屈辱的近代。在这段曲折的历史中，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联手剥削压迫中国人民，也让女性面临更为严重的压迫。为了追求解放，中国女性和全国人民一道走上了追求解放的斗争。在张牧云老师所讲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课中，我深刻认识到了近代中国人民的屈辱与反抗。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性别视角和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女性也应当受到关注。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妇女地位有了空前提高，当下性别议题仍然有许多内容亟待讨论。本文将梳理中国近代史上诸多妇女解放运动与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历史，从女性视角观察中国近代史中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迁，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课程的结束画上一个句号，也对当下社会的性别问题做了有益的思考。

1. 太平天国时期

太平天国作为封建农民推翻清王朝的一次起义尝试，其对治下女性采取的较为宽松的政策常常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先导[[2]](#footnote-2)。

根据现存史料，太平天国妇女确实拥有与传统封建礼教下妇女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例如，太平天国治下女性需要参与各项生产劳动或军事后勤工作，冲击了传统家庭的分工方式[[3]](#footnote-3)；《天朝田亩制度》则从法律层次上规定了女性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天平天国治下女性也拥有一定程度上的社交自由与婚恋自由，也具有参加祭祀活动的权利[[4]](#footnote-4)。

太平天国给予女性的各项自由权利相比传统封建社会有着巨大的进步，但这是否是太平天国领导人主观上推行的“女性解放”政策，仍然有待商榷。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这种自由权利是太平天国发源地广西妇女习俗在太平天国中大范围的继承。由于当地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与母系社会残留，广西壮族、客家等少民妇女相比内地汉族妇女需要承担更多的劳动责任[[5]](#footnote-5)。这也导致广西少民妇女并不受内地汉族妇女极为繁琐的家庭规矩束缚，而更多地享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这种非自发性的政策性措施也未能上升至妇女解放的层次。妇女参与劳动更多的是备战的需要，此时妇女某种程度上被看作为一种廉价的劳作工具[[6]](#footnote-6)。此外，太平军中实行的婚姻制度将女性作为非人的物品[[7]](#footnote-7)。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所带来的妇女解放与其本身一同走向了失败的深渊。

这一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社会整体女性地位的影响极为有限，宏观上的中国女性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太平天国治下的女性也并未从此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8]](#footnote-8)。太平天国运动产生的女性解放的萌芽更不能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广泛的影响。但尽管如此，这种女性解放的潮流也为后续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新文化时期兴起的女性解放运动起到了一定的基础作用。因此，太平天国运动仍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基础。

1. 维新变法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场深刻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思想启蒙运动，除了进一步传播西方制度与思想外，维新变法运动在女性解放这一维度上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较广的社会范围内掀起了女性进步的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晚清妇女地位的嬗变，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真正的起步。

维新思想的底层逻辑在于用人人平等的近代观念抨击三纲五常等封建思想，动摇封建统治的文化根基。为了支持这样的论述，维新派必须承认男性和女性的平等地位，将妇女解放事业作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9]](#footnote-9)。在思想上，维新派大力抨击封建纲常思想，并引入西方近代重视平等的道德规范体系，动摇封建统治中男尊女卑的根基，明确指出了男女平等的愿景。在社会习俗上，维新派抨击包办婚姻和缠足等陋习，为打破社会对女性的诸多限制做出了诸多努力[[10]](#footnote-10)。在教育上，维新派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主张兴办新式“女学”，使得女性获得与男性同样受教育的权利[[11]](#footnote-11)。

尽管维新变法失败，其引领的社会思潮却造成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也为晚清女性地位变化起到了正面作用。首先，维新变法作为影响广泛的变法运动，尽管未留下太多成果，其宣扬的男女平等的社会思潮也在中国的广大地区引起了不可忽视的反响；此外，维新变法对近代女子教育的推动，也培养出秋瑾，陈颉芬等一众为中国女性权益事业奔走的仁人志士，为后期知识女性的政治觉醒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内在条件。在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中，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更多的认可。

但同时，戊戌变法伴生的妇女解放运动仍然具有显著的局限性。如同前文的分析，维新派多是将女性解放运动作为维新变法实行的条件，而非最终目的。在这一阶段，对女性解放的追求并不完全来自于女性自身需求，而是维新派代表社会女性发声的结果。在此之中，女性话语权的使用被越俎代庖，女性根本上仍是男性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这一时期，仅有较少的接受先进教育的女性有解放的内在要求，更广大的妇女群体尚未具备解放的觉悟[[12]](#footnote-12)。但尽管如此，维新变法仍然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对女性的觉醒与社会地位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后，在中国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正式宣告终结，自汉朝以来压迫女性的制度性矛盾得到了部分解决，为女性争取自身解放提供了空前的客观条件。而女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与近代女子教育的蓬勃发展，则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愿意为女性权益事业献身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她们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挑战传统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开启了更大规模的女性解放思潮。此外，资本主义工业在国内的积累发展，也为女性走上社会舞台提供了经济基础。

这一时期的知识女性的觉醒历程，伴随着明显的政治觉醒。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引领社会思潮、投身反帝斗争、追求政治生活[[13]](#footnote-13)。首先，受近代女子教育和近代报刊业蓬勃发展的影响，知识女性相当重视舆论造势工作。例如，陈撷芬创办《女报》，丁初我创办《女子世界》等[[14]](#footnote-14)，将报刊作为女性权益工作的舆论宣传阵地。这些宣传主要集中在反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追求女性各项权益等[[15]](#footnote-15)，在社会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启蒙作用。同时，也有一批女性积极参与到反帝爱国斗争中。如参加辛亥革命北伐军的妇女有数字可查的可达一千余人[[16]](#footnote-16)；在各类爱国运动之中，也能看到女性在其中的身影。辛亥革命女性解放运动相比之前最为进步的一点，则在于女性主动争取参政权利。这一时期涌现出多个政治色彩浓厚的妇女团体[[17]](#footnote-17)，以实际行动追求女子享受平等的参政权。尽管直至民国初年，妇女仍未获得应有的参政权利，且这种政治上的斗争局限于上层知识女性群体，这种自觉性的政治权益的争取仍然在女性解放事业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辛亥革命前后，传统女性家庭角色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变动。这种变动主要表现在部分青年知识女性和资产阶级女性中，主要表现为追求婚恋自主，反抗传统礼教。此外，这一时期部分女性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意识增强，展现出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尽管此时女性解放运动仍存在着局限于城市、过于理想主义、未能提出科学的行动纲领等诸多问题，但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女性社会地位相较之前有了明显的改善。

1. 新民主主义革命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革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随之而来的也有大量女性主义理论与学术著作，推动了马克思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普及，形成了更为科学的女性解放思潮，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中激发了女性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这其中最值得探讨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中在妇女解放议题上做出的诸多努力。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追求妇女解放的指导思想与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独立关系密切。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女性权益问题的解决与整个工农阶级乃至全体中国人民的解放之间关系密切[[18]](#footnote-18)。因此，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在革命中保障女性的各项权益，实现妇女真正的解放。首先，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男女享有平等的劳动权益的保障。共产党倡导治下妇女享有平等的土地与生产所得的分配权，也保障了妇女能够合法参与工会、农会等劳动团体[[19]](#footnote-19)。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推动女性解放，符合马克思主义中的妇女解放理论，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径。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等一系列文件与法律，保证了根据地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地位上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此外，国民政府开展的社会性的移风易俗运动，也为男女同权做出了一定贡献。近代报纸《申报》就刊有一定数量的新时代女性追求自身解放的故事，折射出此时城市女性的解放思潮与地位转变。

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解放思潮与运动达到近代以来顶峰，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男女平等思想传播更加广泛。尽管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封建残余仍然相当顽固，但纵观整段中国近代史，中国妇女能从男性附庸走向独立、自强的道路，已经显示出妇女解放事业的极大进步。

1. 总结

通过对中国近代以来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地位的变化的研究，我深刻认识到女性解放事业是伴随着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全过程的。通过梳理女性解放运动与社会地位的动态变化过程，我对于近现代中国史的理解也进一步加深。中国女性能够取得今天的地位，离不开近代史上为女性权益事业奋斗终身的仁人志士。尽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代，社会上仍有许多性别问题与矛盾客观存在。以史为鉴，党和政府应当切实保障女性的各方面的权益利益，最终实现性别的真正平等与解放。

最后，也感谢张牧云老师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一学期的教导，感谢各位助教在课程中给予我的帮助！

1. 汤二子，《中国歧视女性的社会根源及在国家治理上的红利:古今论据》，《制度经济学研究》，2018年第4期。 [↑](#footnote-ref-1)
2. 王绯，《妇女：法律上的死亡与复活——太平天国革命与中国妇女解放》，《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3期。 [↑](#footnote-ref-2)
3.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7年。 [↑](#footnote-ref-3)
4. 廖胜，《太平天国妇女自由问题之民俗释论——兼论妇女自由不能作为太平天国妇女解放之论据》，《史学集刊》，2005年第4期 [↑](#footnote-ref-4)
5. 罗雄飞，《从客家传统看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矛盾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footnote-ref-5)
6. 王晓南、廖胜，《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与太平天国妇女解放问题之辨析》，《天府新论》，2000年第3期。 [↑](#footnote-ref-6)
7. 夏春涛，《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探析》，《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 [↑](#footnote-ref-7)
8. 夏春涛，《太平天国妇女地位问题再研究》，《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 [↑](#footnote-ref-8)
9. 郭溶，《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footnote-ref-9)
10. 张雨濛，《近代中国的反缠足运动述略》，《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10期。 [↑](#footnote-ref-10)
11. 王美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女子教育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footnote-ref-11)
12. 韩廉，《对戊戌妇女运动局限的历史审视》，《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1期。 [↑](#footnote-ref-12)
13. 陈文联、刘翔，《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的政治觉醒》，《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footnote-ref-13)
14. 姜卫玲，《我国近代知识女性的报刊活动及其社会影响》，《编辑之友》，2012年第10期。 [↑](#footnote-ref-14)
15. 简姿亚，《从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报刊看女性的觉醒》，《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footnote-ref-15)
16. 陈文联、刘翔，《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的政治觉醒》，《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footnote-ref-16)
17. 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文心出版社，1936年。 [↑](#footnote-ref-17)
18. 潘建屯、段俊霞，《简论中国男女平等运动的发展历程》，《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footnote-ref-18)
19. 苏映宇、吴宏洛，《中国共产党女性劳动权益保障思想的百年回顾与经验启示》，《社会保障研究》，2021年第5期。 [↑](#footnote-ref-19)